



中文大學出版社 具有版權的資料

九龍城滄灣區

KOWLOON CITY BAY AREA

第一章

九龍城塘灣區

KOWLOON CITY BAY AREA

提要

在2009年以環境藝術與城市基建為題的研討會在牛棚「1a空間」舉行，與會的陳冠中先生提出塘灣區的概念，誘發整體區域發展的文化想像。自此，這個發展框架結合了在過程中不斷開發的文化及歷史資源，再配合往後發現不同年代的考古遺蹟及由發展局推動的「起動九龍東」計劃，形成了新舊共融、結合歷史、生態、文化及創新的濱海區域。

歷史背景

「九龍城塘灣區」(Kowloon City Bay Area)概念的萌生是始於文化人陳冠中先生於2009年10月31日在「1a空間」主辦「文化基建與城市發展：文化起動·隱見生機」研討會中所提出的概念。參與研討會的主講包括，陳婉嫻議員、鄭炳鴻教授、陳冠中先生、李照興先生及蔡仞姿女士，並由朗天作評論。現場與會者一方面以批判角度審視香港文化圖像，另一方面比較「東九」、「西九」在未來文化發展的可塑性及局限，當中提及香港文化的基因是確立於「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的核心精神。

這個概念的形成是始於對啟德舊機場發展的思考，經長時間及多方的探討孕育出來的。由2006年年中政府組織的諮詢開始，由鄭炳鴻教授、陳婉嫻議員及林文輝先生等代表的啟德發展民間聯席，先後倡議以「歷史、文化、綠色」為連繫的構思，引動周邊舊區發展，以東九龍區二百多萬人流所帶動的本土經濟為基調，利用原有的自然及城市脈絡，包括啟德河、東九龍走廊、觀塘海濱等，形成新舊城區的有機結合。

城市連繫

從城市設計的角度來看，由於舊機場因保安理由必須與周邊分隔，導致多年來不相往來的格局，但隨著啟德舊機場的重新開發，周邊的連繫 (connectivity) 成為區域性活化的關鍵，同時促使本來互不相干的城市肌理逐漸形成互為補足的可能性。位於中心的啟德發展區，與周邊三個以工業生產及草根社群為主的已發展舊區，當中包括東鄰觀塘、九龍灣，北毗新蒲崗、黃大仙，西連九龍城、土瓜灣 (圖一)，因需要重新規劃而衍生對未來城市的想像。這幅圖像與一般新城市發展，只側重功能性有著不同的考慮及意義，簡單地說，這是「舊區中的新區」，因此有著帶動舊區更新的積極意義。

在政府規劃的角度中，往往以土地使用功能為主，如以分區大綱圖劃分地塊，並分別設定功能、交通網絡、社區配套、人口預測等等，以規劃標準及技術指標為出發點，把預設的經濟發展要求，按人口密度等以較合理的平面佈局分配。但「九龍城滂灣區」因為以水體為區域的核心考慮，加上三個舊區與中心新區的整合重組，並且是以連結及綜合現存文化創意產業資源為本位，所以面對的發展挑戰並非以傳統新市鎮模式可以



圖一 九龍城滂灣區地圖

解決；反之，必須以前瞻性視野及人性化角度，配合多層次的設計方案，方可從實際條件及處境制約中全面理解問題的重心，從而借用現有的獨特環境，創造出新舊共融、既有個性又融匯社區特色的發展。

「九龍城滂灣區」的文化內涵

由於香港的製造業隨著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政策啟動而大舉北移，導致本以輕工業為主的多層工業大廈大量空置。然而，這些空置的工業空間因為租金相對低廉而且樓面較為寬闊而在使用上具彈性，吸引了不少從事自由創作的青年藝術家進駐。在這自發有機的情況下形成大小不一的創意群組 (creative clusters)。單以新蒲崗為例，就有不下一百多個話劇及表演藝術團隊於工業大廈



圖二 起動九龍東辦公室

空間進行排練等活動。實際上，這些文創群組，加上現存的在地文化地標，如黃大仙祠、志蓮淨苑、衙前圍村、寨城公園及後來陸續發現的龍津石橋及宋朝古井等古蹟，逐漸形成古今並存的文化地景。

在點算這些星羅棋佈的地標及文化活動區時，正巧發現東端鯉魚門的「魚頭石」及西端海心廟的「魚尾石」這兩處維多利亞港僅存的自然海岸點，以致在地理上可以將整片具文化創造力的新舊海濱發展區歸納起來，形象化地將之理解為水陸互動的「魚躍區域」，亦即「九龍城塘灣區」的地理範圍。

在啟德發展民間聯席提倡這個涵蓋多重意義的地域概念的同一時期，發展局因為釋放閒置多年的觀塘工業區的商業發展潛質而更改該區的發展規劃為觀塘商貿區。另外，為了配合當區公

共場所的持續改善及引進「場所塑造」(place-making) 的營造手段，政府設立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Energizing Kowloon East Office)，致力推廣“CBD²”理念，即「聯繫、品牌、設計、多元化」(connectivity, branding, design & diversity)，以致能重新包裝當區的形象及以更靈活的思維開拓及經營以活動為主的公共空間(圖二)。

陳婉嫻議員及鄭炳鴻教授認為這所由政府設立的辦事處正是民間與官方之間的溝通橋樑。透過溝通的過程，抽象的「塘灣區」圖像得以逐步落實。大抵上，民間與官方的總體概念一致。然而，礙於現時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的權責及政府在區內的業權均為有限，可用於落實「塘灣區」概念的空間只局限於沿海濱及兩端地塊。因應這局限，我們建議沿「九龍城塘灣區」的原初構想，以「文化孕育區域」(Cultural Brewing District,



英文大學出版社 學術版權的資料



圖三 天橋底行動



圖四 鄭炳鴻教授與瑞典師生到啟德發展區考察

CBD²) 為軸心，結連城市內部散佈的文化創意單位，「以線帶面」的方式牽動整區以青年人為主的文化產業。為此，我們先後約見了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的歷任專員（包括凌嘉勤先生、李緻榮先生及何永賢女士），以草圖及建議書的方式商討相關「文化孕育區域」的發展及運作方式。我們亦向辦事處提出在發展當區海濱為公共空間時，必須包括予以年青人發展文創事業的設施，當中包括表演場所、手工藝市集、甚至是結合居住及工作於一身的“SOHO”青年宿舍這較具爭議性的項目。

其後，為了推進這方面的構想，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以「天橋底行動」之名於2013年2月14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催促發展局釋放橋底空間作多元綜合活動之用。我們亦以東九龍沿岸天橋底空間，即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一帶的濱海天橋底約

兩公里的「灰色地帶」，作為先導試點，嘗試以創新手法，通過跨部門的協作，營造出既有生活氣息，又接近當區工業及草根文化的文創地帶。建築方案經兩年醞釀，獲得近二十戶的手工藝及有機農產販商支持。及後，我們把握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015年初所提出的「流動搵食車」（food truck）計劃，於同年4月7日，以臨時攤檔的形式進行實驗性示範，希望喚起公眾對相關理念的理解和興趣。

「九龍城澆灣區」研究的貢獻

除了與政府溝通外，深化當區的社群認知亦是重要的一環。在「九龍城澆灣區」的框架下，我們透過舉辦學術研究活動剖析相關議題。鄭炳鴻教授以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社區營造學社的名義，多次與瑞典皇家工學院（KTH）建築系的老



赫爾辛基市郊的Arabia片區

師博域·博揚 (Boric Bojan) 合作，於2010至2012年的三年間，先後三次帶領瑞典師生，以啟德發展區 (圖四)、大磡村及沿啟德河兩岸發展為題材，以「城市再用」 (Urban Reuse) 的主題進行研究，希望透過國際視野就相關的城市、生態及水陸兩棲等議題作深入討論，藉此開拓對啟德與周邊發展的機遇。

這些城市研究，除了有助了解瀆灣區所面對的獨特議題外，包括水質污染與水岸活動的矛盾、公共領域與文化創意的互動、綠色社區與高密城市的關係等，更能以國外相若的經驗及實踐作為借鑑，補足我們的發展計劃。2011年夏天，鄭炳鴻教授帶領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學生到北歐反饋造訪，從考察中學習。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Hammarby-Sjostad”，了解如何透過多年的規劃及綠色建設將原先的工業廢置區 (brownfields) 轉化成生態與社區共棲的景象；另外，我們亦參觀了在赫爾辛基市郊的“Arabia”，它原本是一個半廢棄的工廠區，經文化及藝術產業而活化成一個多元生活的社區。這些城市改造的例子豐富了我們的想像，當中的經驗成為了我們思考「瀆灣區」可塑性的參考。



斯德哥爾摩的Hammarby Sjostad 片區

為了檢視位於「塘灣區」的土瓜灣及九龍城一帶的發展方向，於2009年，我們在發展局的支持下，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平台對該區進行歷史文物及社區脈絡的研究，編製基礎資料及提出建議。我們更以「十三街」及「牛棚藝術村」為核心，倡議以五百米步程串連起不同的地標，形成可遊可達的步行網絡，拓展為「草根文化創意生活區」。為了進一步探討其可行性，於2011年初我們特意邀請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團隊，由李燦輝教授 (Prof. Tunney Lee) 率領約十多名研究生來港作深入調查研究，並於同年年中就多元社區的發展模式作出寶貴的建議。另外，亦於2011年底，我們與日本橫濱大學 (GSA) 師生於啟德河上游的大磡村地塊進行以「青年工作住房」(Youth SOHO) 為題的設計方案研究，探討該區的電影歷史與新建設對區內城市面貌的影響。

這些設計嘗試，除了是學術的探求外，更是以具象的形態來認識在地的情況，並以創造的手法推敲其可行性。無可否認，距離落實這些構想仍有相當路程，但在過程中，我們體驗到藉著客觀分



赫爾辛基市郊的Arabia片區

析及設計想像，可以讓更多人一起建構自身城市的願景。在不同階段中，地區性的城市研究實實在在地豐富了我們對似曾相識但往往擦身而過的地區歷史及城市現象的認識和參與。這些都有助我們與政府不同的部門溝通，以致能取得共識而創造出新的觀點與設計構想。

誠然，探討「九龍城塘灣區」的過程涉及問題多於答案。但這提供了一個更有系統的思想框架，讓市民能以空間整合的方式，更直觀地了解正在改變中的社區及當中的生活。如此，市民不應單是被動地接受政府及專責部門提出的抽象計劃。市民對未來城市的期盼不應被「專業」的發展指標所取代。這種以學術研究及設計建議的導入式規劃過程能更為人性化地將地區上不同社群的意願反映在探索的過程中。或許，這與政府一向推行的階段性「公眾諮詢」方法有所分別。前者的基本信念肯定社會願景及規劃實踐是彼此相關、互為調整的。由此角度看，我們不禁要問，民間倡導由下而上的規劃模式在香港是否應該只限存在於「諮詢」的範圍內，抑或應有更寬闊的應用空間呢？

參考資料：

1. 啟德發展民間聯席：〈一個啟德，兩個面，三條線：對啟德規劃經修訂的初步發展大綱圖的意見〉（2006年11月14日）。參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plw/papers/plw1114cb1-284-3-c.pdf>。
2. 〈團體促善用天橋底 倡建臨時藝術場所〉，《明報》（2013年02月15日）。參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044254/>。
3. 鄭炳鴻：〈九龍塘灣 你我共建〉，《信報》（2015年05月02日）。參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044254/>。
4. 〈論壇：文化基建與城市發展〉。參 https://www.youtube.com/user/1aspace/feed?activity_view=3。